

论《强盗新娘》中欲望模仿结构的伦理意义

王青璐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摘要] 在《强盗新娘》中处于伦理混乱与主体分裂状态下的三位主人公托妮、查丽丝和洛兹对自我形象和女性形象的探索构成了文本伦理主线。三人在探索中两次建构欲望模仿结构的情节为伦理线上的伦理结。在第一次建构的欲望模仿结构遭遇破坏后,三人意识到她们力图模仿的传统女性美德已失效,也不再压抑分裂出的阴暗自我。在第二次建构的欲望模仿结构中,三人与中介泽尼亚形成双重束缚关系,但她们通过伦理选择放弃暴力报复,成为真正有道德的人。

[关键词] 《强盗新娘》; 欲望中介; 伦理混乱; 伦理身份; 伦理选择

[中图分类号] I3/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20)03-0099-06

DOI:10.13967/j.cnki.nhxb.2020.0052

加拿大文学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发表于1993年的《强盗新娘》是一部探寻女性理想身份的小说。现有研究主要从精神分析批评和后殖民批评的角度对作品进行解读。唐纳·邦塔提布斯认为“泽尼亚代表无意识元素、影子或者主人公们的精神分裂层面的物质表现”^[1]。潘守文认为叙述者对泽尼亚的态度反映了“叙述者及其所属的加拿大主流社会对难民的猜疑、歧视和恐惧,反映了加拿大多元文化体制下的深层矛盾”^[2]。本研究认为,《强盗新娘》展现了托妮、查丽丝和洛兹三位主人公经历伦理混乱和主体分裂,通过建构欲望模仿结构来解决三人错误的伦理身份定位,走出伦理困境,超越与欲望中介的双重束缚关系,成长为有道德的人的历程。通过展现托妮、查丽丝和洛兹三人建构欲望模仿结构的过程,小说对传统女性品德进行否定,传达性别平等观念。

一 伦理混乱中的主体分裂感受

勒内·基拉尔在《浪漫的谎言与小说虚构》中提出了一个由主体、介体和欲望客体构成的三角欲望的模式。勒内认为,在一些文学作品中,欲望主体并非直接接近或达到欲望客体,而是通过“对抗介体产生欲望”^{[3]22}。由此,在主体、欲望客体和介体间形成了三角欲望模仿结构。主体并非直接指向欲望客体,而是指向中介。作为主体的人物通过模仿、靠近中介,来达到他的欲望客体。基拉尔以《堂吉

河德》等文学作品为例进行了说明。堂吉河德对游侠骑士阿玛迪斯有着崇拜之情,其一举一动都在向阿玛迪斯看齐。实际上,堂吉河德真正向往的是骑士生活,他是在以阿玛迪斯为介体进行模仿,让自己与理想中的骑士形象靠近:“堂吉河德有了阿玛迪斯,便抛弃了个人的基本特性:他不再选择自己的欲望客体,而由阿玛迪斯替他选择。”^{[3]2}在堂吉河德、阿玛迪斯和骑士生活三者中,堂吉河德为欲望主体,骑士生活为他的欲望客体,他所模仿的阿玛迪斯是达到理想骑士生活的欲望介体,由此建构出了欲望模仿结构。《强盗新娘》中的三位主人公托妮、查丽丝和洛兹与泽尼亚等人之间的关系可以用这个三角欲望模仿结构进行解释,三位主人公是欲望主体,泽尼亚等人是她们三人探索自我达到理想女性形象欲望客体过程中选用的欲望中介。三人之所以会建构欲望模仿模式,与她们所处的伦理混乱状况有关。伦理混乱“指伦理秩序、伦理身份的混乱或伦理秩序、伦理身份改变所导致的伦理困境”^{[4]257}。在《强盗新娘》中,伦理混乱表现在三位主人公对现实自我伦理身份的失败认知上。三人对自己的现实身份有所不满,但又无法进行正确的自我认知活动。

在缺乏正确的自我身份认知的情况下,三人通过主体分裂产生带有另一个姓名的自我来否认现实自我。主体分裂是三人深陷伦理混乱处境的表现。托妮·弗雷蒙在年幼时就分裂出一个比她“更高、更强壮、更勇敢”的孪生姐妹“蒙雷弗·尼托”^{[5]149}。

[收稿日期] 2019-10-22

[作者简介] 王青璐(1992-),女,广东肇庆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玉溪师范学院文学院教师。

这个通过倒写名字产生的分裂物和她被外界排斥的左撇子生理特征有关:老师会用手或者用尺子打她的左手;母亲强迫她长时间练钢琴以强化她的右手。这致使托妮为自己的左撇子特征感到“不体面”“羞耻”^{[5]149}。托妮还十分瘦弱,无法完成母亲要求的户外活动。因此她分裂出的蒙雷弗又拥有着强壮的体格,是个在草原上疾驰,“蓬乱的头发在风中飞舞,一手握一把剑”^{[5]159}的野蛮人。查丽丝是从卡伦体内分裂出的一部分,意为慈爱。卡伦认为新分裂出来的“查丽丝比卡伦更尊贵,因为坏东西都留在小卡伦那里”^{[5]284}。小卡伦先是遭遇亲生母亲的虐待,在搬到姨妈、姨父家居住后又被姨父“从中间把她撕成两半”地性侵。于是卡伦把自己“分裂成两个人,然后待在更冷静更干净的那一部分”^{[5]283},这一部分名为“查丽丝”。但是卡伦并没有消失,她只是潜伏在查丽丝体内。洛兹原来用的名字是罗莎琳达·艾格尼丝·格林伍德,名字的变更是由其父母主导的,但也导致了主体的分裂。在用罗莎琳达的名字时,她随天主教徒母亲生活在仇视难民和犹太人的天主教教区。直到父亲归来,她才知道自己也是个犹太人,父亲和叔叔都属于难民。恢复原来的名字也意味着洛兹恢复了原来的犹太人身份。可在新的学校和犹太人夏令营中,她格格不入:“她太大,也太吵,太粗俗,太渴望讨人喜欢”,“不圆通,不乏味,也没有类别”^{[5]373}。洛兹从小就能感觉到“自己和其他人不一样,他们在他们中间,却不是他们的一部分”,有什么东西“将她分别出来,一种看不见的障碍,模模糊糊地在那儿”^{[5]353}。

小说还展现了人物从女性身份和加拿大国民身份中感受到的危机感和困惑感。三位主人公和她们身边的其他女性都表达过对男性的排斥。泽尼亚对托妮说过,“所有男人都是变态”^{[5]144};对查丽丝说过,“在内心里他们都是强奸犯”,“任何男人只想从女人那里得到一样东西,就是性”^{[5]247}。洛兹对精神狂暴症状的评判是:“你知道女人在经前综合症的时候,体内有些化学物质是吧?那么,男人在所有时间都有那种物质”^{[5]24}。洛兹的母亲和她家曾经的房客伊顿太太都批评男人“会占便宜”^{[5]351}。查里兹的同事莎安妮塔认为,“到处都是懒惰的男人”^{[5]65}。就连洛兹的双胞胎女儿都提出了要对经典童话故事进行性别重塑的要求,“所有故事里的主角都应当是女性”^{[5]318}。

小说的主人公们也感受到作为加拿大国民的身份困惑感。小说以洛兹开车所见的景象来象征国民身份形象的建构问题。洛兹所见都是枯燥无味又失

败的设计,无论如何搞都像从主题公园跑出来的东西。洛兹总结,人们所谓的国民身份是“借来的装备、背景幕、道具”^{[5]96}。三位女主人公也都表达过对白人身份的否定。托妮在唐人街获得认同感,理发店的员工会欣赏她的小脚小手,扁平的屁股,心状的嘴,“他们说她几乎是个中国人”,而且“在中国人当中,她觉得自己高度正好”^{[5]40}。查丽丝为只能做个白人,“一只白色兔子”,感到疲惫,她希望下辈子“做个混血,一个精力旺盛的杂种,像莎安妮塔那样。就不会有人敢怎样她了”^{[5]63}。洛兹花了“前半辈越来越不觉得自己是个移民,现在正在花费她的另半辈子时间让自己越来越觉得像个移民”^{[5]84}。

菲奥娜·托兰认为在阿特伍德作品中无论是加拿大民族主义问题还是女性主义问题,“都是同一愿景的一部分”,“女性主义经验对理解阿特伍德的小说十分重要,因为在许多方面它反映了她对加拿大政治权力关系的批评”^[6]。还有研究者单独发掘了小说的政治寓意。丁林棚认为《强盗新娘》反映了“后现代语境中加拿大的民族和国家身份认知。自我/他者的对立被消解,他者不仅成为自我的内在部分,而且自我开始具备多重性、居间性和混杂性”^[7]。他还指出三个叙事者和泽尼亚象征“加拿大身份的不同方面,是阿特伍德的加拿大精神的缩影”^[8]。实际上,《强盗新娘》中出现的性别极端对立的情绪和国民身份认同的困惑感都属于主人公病态认知体验的一部分。在主人公有关危机感和身份困惑感的表达中,理性成分是很少的。人物的体验更近于一种已经挣脱理性束缚的自然情感的宣泄。这些体验也能证实主人公处于伦理混乱状态中。同时它们也指出改善群体危机感的一个方案就是要落实到个体的体验和需求中,提出要关注个体的主体分裂的处境,着力从个体出发解决问题。

二 伦理身份错误定位中的“外中介”欲望模仿结构

三位主人公通过选择建构欲望模仿结构,模拟欲望中介来对抗由伦理混乱导致的主体分裂体验,从而达到理想的女性形象。伦理主线是“贯穿整个文学作品中的主导性伦理问题”,它“把伦理结串连起来,形成错综复杂的伦理结构”^{[4]265}。三位主人公对理想女性身份的探寻构成小说的伦理主线。她们前后两次通过模仿欲望中介来接近欲望客体的活动,是伦理主线上的两个伦理结。泽尼亚则在两个伦理结的建构过程中,分别起到破坏欲望模仿结构和成为三人的欲望中介的作用。托妮、查丽丝和洛

兹先是分别以泽尼亚、外婆和母亲作为各自的欲望中介,通过模拟欲望中介来处理个人伦理身份问题,对抗主体分裂后产生的危机感。

基拉尔在《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中将欲望中介根据与主体间的精神距离分为外中介和内中介,他指出外中介中“介体与主体各居中心的两个能量场的距离太大,彼此不接触”,“外中介的主人公公开宣布欲望的真实性质,他景仰模式,宣称步其后尘”^{[3]9}。作为主体的托妮、查丽丝和洛兹对这一阶段的欲望中介泽尼亚、外婆和母亲都表现出“景仰”的态度,她们在与中介拉开距离后,都尝试通过模仿中介达到欲望客体。这一阶段,她们选择的中介属于欲望外中介。在欲望模仿结构中,“派生欲望的主角力图借着尽可能忠实的模拟,获得模拟对象的存在”^{[9]30}。

三位主人公想要通过模仿中介,成为理想中的传统女性,来抹杀她们每人主体分裂出的阴暗自我。泽尼亚给托妮的第一眼印象是如月亮一般美丽。托妮在她面前感到了自己外貌上的渺小与可笑。卡伦对拥有神奇能力的外婆十分崇拜,在看到外婆用神奇的蓝色亮光治愈别人和自己流血的伤口后,愿意模仿外婆,“愿意触摸鲜血,愿意去止住流血”^{[5]267}。在遭遇姨父侵犯后,她获得了外婆的力量。洛兹非常肯定母亲的道德品行,知道“她母亲是对的,父亲是错的;她母亲很贞洁,辛勤工作以至于毁了她的手,却被忘恩负义”^{[5]368}。虽然洛兹从小被父亲赋予厚望,被视为“得力助手”,但“洛兹不想做儿子”,不想成为父亲那样的人^{[5]332}。

三人的外中介欲望模仿结构遭到了泽尼亚的破坏,这也意味着她们向传统女性看齐的伦理身份定位的失败。在托妮被泽尼亚身上的传统女性美德吸引后,又发现了自己与泽尼亚间存在共同点。据泽尼亚所说,她的母亲是白俄,为钱把她卖给各种男人,最后死于肺结核。这样的经历比托妮的原生家庭背景更为不幸:托妮的母亲与情人私奔,最后死于溺水,父亲在托妮中学毕业时自杀。“模拟欲望的主体模拟他人的欲望,将他人的欲望当作自己的欲望,结果必然是主体跟他的模拟对象觊觎同一个目标”^{[9]49}。因此在托妮看到泽尼亚和韦斯特亲热时,“她从前从没见过两个人相爱。她觉得自己像个流浪的小孩,衣衫褴褛,非常冷,鼻子贴住明亮的玻璃窗”^{[5]173}。所以她冒着学术作假的风险帮泽尼亚写课程论文,在泽尼亚敲诈她一千美金离去后,代替泽尼亚“接管”韦斯特。可她却为此感到自信、开心:“终于有人真的对她有某种需要了,最终她发现了

她一直想知道的事:她的内心比外表大。”^{[5]193}直到一天,泽尼亚回来又“收回”了韦斯特,就像“收回属于自己的每一件财产”^{[5]197},破坏了托妮建构的欲望模仿结构。

查丽丝以外婆为欲望外中介,模拟外婆的农庄隐居生活,独自在岛上居住。她饲养鸡群,收留逃兵役的美国人比利和声称患有癌症的泽尼亚来实现对外婆的模仿。在查丽丝看来,除了爱,剩下的“只有残忍,只有羞耻,只有暴行,只有痛苦”^{[5]247}。她将善与恶的绝对对立化,也因此变得愚昧、善恶不分,近于失去理智:她不信任加拿大骑警,认为他们“阴险狡猾,和美国政府是同伙”^{[5]226};认为“有义务对陌生人的好,特别是那种背运的陌生人”^{[5]229}。在照顾泽尼亚的过程中,查丽丝感到自己“能干而善良,满溢着善意和活力”^{[5]240}。最终泽尼亚打破了查丽丝对平静生活与善的幻想,结束了她对外婆的模拟。在查丽丝宣布自己怀孕后,泽尼亚带走了比利,还在临走前屠杀了她的鸡群。

洛兹以母亲作为欲望中介,模仿母亲去对付爱出轨的丈夫密奇:将婚姻等同于生意,知道“什么时候下注,什么时候虚张声势,什么时候收手”^{[5]326}。她从小看透了父母间的相处模式,知道父亲的痛苦和装腔作势“是个表演,或者部分是表演,而他实际上已经没事了”^{[5]367}。她将自己与丈夫在婚姻危机前算总账式的对话视为正常:“他会解释,她会受伤;他会装作悔改,她会装作相信他。他们面对彼此,两个纸牌老千,两个扑克玩家。”^{[5]409}洛兹误以为自己对母亲的模仿正确可行:丈夫“会像她父亲欺骗她的母亲一样欺骗她,她会像母亲所做过的那样,不断地原谅他”^{[5]416}。于是,盲目自信的洛兹让泽尼亚进入了自己的生活,结果在泽尼亚的迷惑下,丈夫彻底同家庭断绝关系。

从文学伦理学批评角度来看,托妮、查丽丝和洛兹的伦理身份定位失败和欲望模仿结构的建构失败,均与她们在行动中对自然情感的放纵有关。自然情感是“不受道德约束的一种生理和心理反应”^{[4]280}。建立欲望模仿结构的初衷是压抑她们不愿承认的那部分阴暗的分裂主体,但这一行动本身是不理智的、情绪化的。基于不能够正确认识、处理分裂主体的意义和价值,她们选择的欲望中介也起不到树立道德榜样的作用。因此她们无法通过模拟外中介来产生伦理意识,成为有道德的人。所以三人的失败和遭遇伤害是必然的,正如洛兹双胞胎女儿对《三只小猪》故事的重新解读:至少应该有一只小猪掉进开水锅里,“因为它们都非常笨”,“必须有

人被烫”^{[5]319}。泽尼亚的破坏也意味着女性传统美德和传统女性形象的失效。“欲望的摹仿结构并非静态的,而是不断移位的、动态的”^[10],在泽尼亚破坏了托妮、查丽丝和洛兹三人第一次建构的欲望模仿结构后,她们也由此进入了新的女性身份的探索过程中,进入了第二阶段的欲望模仿结构的建构尝试中。

三 伦理两难中的“内中介”欲望模仿结构

在三位主人公与各自伴侣的关系遭遇泽尼亚的破坏后,三人建构的外中介欲望模仿结构也走向了失败,这也标志着三人幻想中的传统女性形象的破灭,因为“在传统女性浪漫主义小说的思想意识中,得到权力就是得到男人,因为男人就是权力”^{[11]81}。之后,三人开始接近泽尼亚,建构新的自我形象。泽尼亚成了三人在新一轮欲望模仿结构中通往欲望客体,即新的理想女性形象的欲望中介。

根据基拉尔对欲望中介的分类,在第二阶段的欲望模仿结构建构中,泽尼亚属于三人实现理想女性身份过程中的内中介。在内中介里,主体“非但不承认自己是忠实的随从,而且一心想弃绝与中介的联系”。但是介体也可能会与主体产生摩擦和碰撞,“追求遭到介体自身的破坏,因为介体觊觎或者可能占有客体”^{[3]10}。三人对待泽尼亚的态度十分复杂:一方面,她们敬佩泽尼亚,具有成为另一个泽尼亚的心愿;另一方面,三人对泽尼亚还有着强烈的敌对情绪。托妮害怕泽尼亚再度抢走丈夫韦斯特;查丽丝希望通过泽尼亚得知前男友比利的信息;洛兹对泽尼亚抛弃丈夫密奇并致其自杀一事怀恨在心,更在知道儿子拉里与泽尼亚关系过密后濒临崩溃。

三位女主人公在这一阶段对泽尼亚的复杂矛盾态度,源自她们所处的伦理两难处境:如何在主导世界的男性力量的支配下实现自我?她们该放弃理想和事业,成为传统女性,还是违背性别定义,争取自我价值。伦理两难是一种必须要在两项选项中做出非此即彼选择的情形。对于伦理两难的纠结在托妮和洛兹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因为她们都插手了曾经由男性主导的事业,还成为行业佼佼者。她们不仅活在男性的凝视下,还同样受到同性的排斥。洛兹曾被《多伦多生活》杂志评选为“多伦多最具影响力的五十个人”,得到了一定的认可。但她知道普通女性不会认可她的成功:“女人不会觉得你是老板,只觉得你也是个女人。”^{[5]97}为了能团结公司员工,洛兹在办公室扮演起母亲的角色,照顾她的女性手下。托妮是研究战争的历史学家,她因职业形象

与传统女性形象不符,受到男性和女性历史学家的双重排斥:“男性历史学家认为她正在侵入他们的领地”,“她应该写写社会历史”;女性历史学家“认为她应该研究出生,而不应该是死亡”,“她们觉得她令妇女失望”^{[5]23}。

主人公们为实现自我价值而陷入挣扎。她们意识到自己实际是在与强大的传统男性力量进行博弈。她们发出了对自己力量的质疑:“一切事物都是由男性的幻想驱动的吗?”^{[5]426}“谁知道潜伏在男人心里的邪念是什么?一个年长的妇人知道。但是需要变多老才能得到那种智慧呢?”^{[5]424}三人的不自信让她们主动接近了泽尼亚。科拉尔·安·豪厄尔斯肯定泽尼亚“代表她们没能实现的阴暗自我”^{[11]83},帮助她们界定自己。泽尼亚在形象上符合绝大多数男性的审美,比三位主人公更具形象优势。在洛兹的丈夫密奇看来,她是个“女冒险家”^{[5]398},“像大头钉一样锋利,鞭子一样伶俐”^{[5]400}。不过,在本质上泽尼亚与托妮、洛兹一样,也在挑战着传统男性权威。她甚至是这场性别斗争的领袖,带领着托妮和洛兹从传统性别成规中逃脱。正如让·怀亚特所见,只有当女性团体“承认了女性之间的嫉妒和矛盾感,并学会将它们与女性培养和支持彼此的愿望结合起来时”^[12],才能找到现实帮助。如洛兹所见,两性战争是一种“混乱的争夺”,“人们会在即刻之间改变忠诚”,而“泽尼亚则是个双重间谍”^{[5]198},只有她能够超越于两性之上,完成三位女主人公无能为力的难题。

波茨认为三位女主人公是希腊神话故事《三个金苹果》中的三位女神的变体,“查丽丝与阿弗洛狄特相似”,“托妮(安东尼亚)的名字是“雅典娜”的变体”,“洛兹和第三位女神,与母爱和婚姻之爱相连的赫拉相似”^[13]。在传统神话故事中,三位高高在上的女神无法摆脱男性王子帕里斯的审视和评判。《强盗新娘》对《三个金苹果》进行了改写,女神们在泽尼亚的帮助下,成功摆脱了男性的凝视。如查丽丝的感受,“泽尼亚被注入她的生命——被她选择——来教她某些东西”^{[5]495}。泽尼亚与圣洁的女神相对,但她“没让自己被塑造成男性的幻想”,相反还“自己利用这种幻想”^{[5]427}。她是童话故事“强盗新郎”的变体——“强盗新娘”,“埋伏在黑森林的宅邸,狩猎无辜迷人的少年,在她的大锅里置之于死地”^{[5]320}。她是女妖塞壬,上岸“孜孜地从事她们的买卖,清空男人的口袋”^{[5]426},同时也保护了遭遇危机的女主人公们。

阿特伍德在2014年发表了《强盗新娘》的续写

故事《我梦见泽尼亚和她的鲜红獠牙》。在这部短篇小说里,主人公们继续获得泽尼亚的帮助。查丽丝相信泽尼亚的亡灵附到小狗韦达身上,让她免受比利的伤害。三人十分肯定泽尼亚“就像是她们每个人神秘的另一重自我,帮她们实现自己没有勇气去实现的事”^[14]。三人对泽尼亚的肯定预示着将泽尼亚视为欲望中介并进行接近或模仿的可能性。可是,与内中介的距离过密引起了双方间的冲突和暴力,由此三人必须做出伦理选择方能成为真正有道德的人。

四 双重束缚关系下的伦理选择

在主体与中介距离过近的情况下,主体与中介间又可能会产生矛盾。因为中介也可能反向干预主体的模仿结构建构,导致双方间构成双重竞争关系,甚至会引起主体与中介的敌对状态。基拉尔将这种关系称为双重束缚。双重束缚关系又容易导致暴力,“中介一步步靠近,它激发的崇敬之情就会一步步让位于满怀仇恨的竞争”^{[9]30}。三位主人公都感受到来自泽尼亚的威胁,泽尼亚就像“西部片里戴着黑色帽子的人那样”,而这边三个人则“怯懦地挤在一张桌子前,装作没看见她并避免目光接触,像小镇居民扑进干货柜台后面藏身那样,远离火线”^{[5]111}。在她们印象中,泽尼亚是贪婪的,她“想要自己没有的东西,得到她想要的东西,然后藐视已经得到的东西”^{[5]413}。

基于泽尼亚曾给她们的生活制造过痛苦,三位主人公都对泽尼亚产生了进行血腥报复的冲动。如果保持了先前的创作习惯,阿特伍德或许会安排三位女主人公轮番对泽尼亚进行暴力讨伐。正如在《强盗新娘》前出版的小说《猫眼》,童年备受欺负的女主人公伊莱恩先是在中学时期对伤害过她的同伴科迪莉亚进行报复,在成年后更是以绘画的方式对伤害过她的史密斯太太进行反击。戈德布拉特也指出,阿特伍德在前期创作中表现出一种创作习惯:“怀揣美好愿望的人物不能变成天鹅,也无法摆脱来自现实生活的嘲弄。不过,她可以戴上新面具并欺骗那些曾经伤害过她的人。”^[15]

《强盗新娘》中的三位女主人公放弃了报复行动,她们通过伦理选择,以宽恕、原谅代替暴力复仇。在托妮前去阿诺德花园酒店寻找泽尼亚时,分裂出的“蒙雷弗·妮托,野蛮人的女王”^{[5]441}在指挥她进行杀戮。她的“超大号的手提包里面是父亲的卢格手枪”,此外还有一个附有螺丝刀的无绳电钻。她感到奋力追踪泽尼亚让自己“变成一个毛茸茸的白

色魔鬼,有着毒牙的怪兽”^{[5]440}。在与泽尼亚见面中,托妮还被泽尼亚以论文代写事件要挟。可托妮没有放任蒙雷弗出来肆意虐杀,而是让泽尼亚平安地度过了这次会晤。查丽丝在见泽尼亚时,被泽尼亚的话语激怒了,她感到自己的生活就是“一个空空大开的硬纸板箱,翻到在马路边上,里面什么人都没有”。但是她意识到“不管泽尼亚做了什么,不管她曾经有多邪恶,她需要帮助”,于是张开嘴说出了:“我原谅你。”^{[5]471}还用了外婆赠予她的超能力“内在之光”,成功抑制住体内愤怒的卡伦。在得知儿子拉里与泽尼亚关系过近的消息后,洛兹独自跑去见了泽尼亚。面对泽尼亚的威胁,她想象过偷袭泽尼亚并“弄成奸杀的场景”^{[5]483},可是到最后,她恢复了理智,放弃杀戮,转身离开。她们抑制住对泽尼亚的极端仇恨的情绪,正确认识到泽尼亚对于她们人生的意义,从而成为伦理意义上的人。查丽丝对这次考验进行总结:如果她们屈服了,“就会杀了泽尼亚,身体上或者灵魂上的,而杀了泽尼亚等于变成了泽尼亚。另一个屈服的方法是相信泽尼亚,让她把她们撕裂”^{[5]486}。

在主人公们离开酒店后,泽尼亚依旧难逃厄运,神秘离世。结局中的意外身亡事件也令三位女主人公对暴力行动、血腥报复的否定得到最终落实。小说以哥特小说中常见的神秘离奇的死亡情节,终结了带有恶棍形象色彩的泽尼亚的生命,也终结了小说中存在的性别危机和女性自我价值实现的难题。同时也反映了作者阿特伍德的作品中表达的对暴力的反对,以及对宽恕、和平的推崇。

小说通过展现困滞在伦理混乱中的三位主人公模仿欲望中介,建构欲望模仿结构,实行身份探索,进行伦理选择的经历,表现了女性在探寻个人与性别身份过程中的困惑。尽管托妮、查丽丝和洛兹在与泽尼亚的较量中从未占过上风,但这样的情节安排也相当真实地表现了女性个体的缺陷,反映了阿特伍德对女性形象多面性的关注与探索:“让我们容忍女性的不完美之处,不论作品中的女性还是生活中的女性。”^[16]《强盗新娘》反映了传统女性形象的薄弱,号召女性突破传统束缚,并提倡在两性斗争中采取和平的解决途径。

[参考文献]

- [1] DONNA BONTATIBUS. Reconnecting with the Past: Personal Haunting in Margaret Atwood's The Robber Bride [J]. Papers on Language & Literature, 1998, 34(4): 358-371.

- [2] 潘守文. 多元文化语境下族裔身份的解构与建构: 评阿特伍德的《强盗新娘》[J]. 国外文学, 2007(2): 109-117.
- [3] [法]勒内·基拉尔. 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M]. 罗 芑, 译. 北京: 三联书店, 1998.
- [4] 聂珍钊. 文学伦理学批评导引[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 [5] [加]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强盗新娘[M]. 刘国香,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6.
- [6] FIONA TOLAN. Situating Canada: The Shifting Perspective of the Postcolonial Other in Margaret Atwood's The Robber Bride[J]. American Review of Canadian Studies, 2005, 35(3): 453-470.
- [7] 丁林棚. 阿特伍德的《强盗新娘》中的民族身份叙事[J]. 山东外语教学, 2016(6): 79-85.
- [8] 丁林棚. 自我、社会与人文: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小说的文化解读[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83.
- [9] [法]勒内·基拉尔. 欲望几何学[M]. 罗 芑, 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
- [10] 李雪, 毕晓. 摹仿的暴力与他者问题: 勒内·基拉尔新解[J]. 文艺理论研究, 2017(4): 143-150.
- [11] CORAL ANN HOWELLS. Atwoodian Gothic: From Lady Oracle to The Robber Bride [M]. Margaret Atwood. Modern Novelists, London: Palgrave, 1996: 62-85.
- [12] JEAN WYATT. I Want to Be You: Envy, the Lacanian Double, and Feminist Community in Margaret Atwood's The Robber Bride [J]. Tulsa Studies in Women's Literature, 1998, 17(1): 37-64.
- [13] DONNA L POTTS. The Old Maps Are Dissolving: Intertextuality and Identity in At wood's The Robber Bride [J]. Tulsa Studies in Women's Literature, 1999, 18(2): 281-298.
- [14] [加]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石床垫[M]. 邹旻葳, 译. 郑州: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7: 216.
- [15] PATRICIA F GOLDBLATT. Reconstructing Margaret Atwood's Protagonists [J]. World Literature Today, 1999, 73(2): 275-282.
- [16] [加]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好奇的追寻[M]. 牟芳芳, 夏燕, 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2: 37.

The Ethical Meaning of the Structure of Mimetic Desire in The Robber Bride

WANG Qing-lu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Abstract: In *The Robber Bride*, the exploration of self-image and female image by Toni, Charles and Lots, the three protagonists in the state of ethical confusion and split subject, constitutes the main ethical line of the text. The plots of the three characters' construction of the structure of mimetic desire twice in their exploration are the ethical knots on the ethical line. The three characters realized that the traditional female virtues they tried to imitate had failed and that they no longer suppressed their split subject during their first attempt to construct the structure of mimetic desire. In their second attempt, they formed a double bondage relationship with the mediator Zenia, but they gave up violent revenge because of ethical selection and became truly moral people.

Key words: *The Robber Bride*; the mediator of the desire; ethical confusion; ethical identity; ethical selection

(本文编辑:魏月华)